

中國的自由教育

周策縱題



李榮安、方駿、羅天佑

培生教育出版北亞洲有限公司2001



教育基礎叢書系列 2 中國的自由教育

教育基礎叢書系列 2

中國的自由教育

Foundations in Education Series 2

Liberal Education in China

教育基礎叢書系列是一套優質的教育叢書，其出版宗旨在於改進學與教的效能，推廣行之有效的教學經驗，引進教育新意念和促進教育改革。為確保叢書的學術水平，每本書均會經過學術界的不記名評審。

《中國的自由教育》乃叢書的第二本，作者從五四運動的教育影響、道德與公民教育、平民教育、科學與人文教育等多方面，回顧百年來中國自由教育的發展歷程，並探索現在和未來的發展路向。

本書資料詳實，內容豐富，行文流暢，實為各級教師及廣大關心教育發展的人士不可或缺的參考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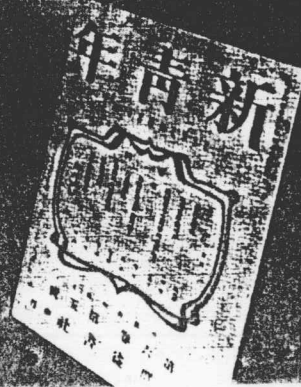


教育基礎叢書系列 2

中國的自由教育

系列主編：李榮安

李榮安、方駿、羅天佑



朗文香港教育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979 號
太古坊康和大廈十八樓
電話：3181 0000

網址：<http://www.ilongman.com>
電子郵件：info@longman.com.hk

© 培生教育出版北亞洲有限公司 2001

本書版權為朗文香港教育所有。如未獲得本公司之書面同意，
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節錄或翻印本書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圖片。

二〇〇一年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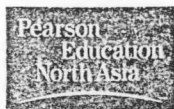
出版：朗文香港教育
SWTC/01

ISBN 962 00 8872 7

鳴謝

封面照片：復旦大學教學樓，由香港教育學院校長許美德教授提供，謹此致謝。

本出版社已盡力追溯照片來源，但仍有部分照片未能查明出處，如其版權遭受侵犯，謹此致歉，並歡迎有關人士提供來源。



The
publisher's
policy is to use
paper manufactured
from sustainable forests

中國的自由教育 周策經題

香港教育學院 教育基礎學院

出版委員會

Publications Committee, School of Foundations in Education,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顧問：

許美德教授

香港教育學院校長

鄭燕祥教授

研究及國際合作中心總監

Advisors:

Prof. Ruth Emilie HAYHOE

Director,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Prof. CHENG Yin Cheong

Centre Director, Centre for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出版委員會成員：

李榮安教授 (系列主編)

教育基礎學院院長

陳城禮博士 (主席)

科學系

方駿博士

社會科學系

香煥琮博士

特殊學習需要與

融合教育中心

許明輝博士

課程及教學系

古鼎儀博士

教育政策與行政系

郭正博士

教育心理、輔導與

學習支援系

Publications Committee Members:

Prof. LEE Wing On (Series Editor)

Dean, School of Foundations in Education

Dr. CHAN Sing Lai (Chairman)

Department of Science

Dr. FANG Jun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Dr. HEUNG Woon King

Centre for Special Needs and Studies in
Inclusive Education

Dr. HUI Ming Fai

Department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Dr. KOO Ding Ye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Dr. KWOK Ching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Psychology,
Counselling and Learning Needs

總序

李榮安

《教育基礎叢書》主編

香港教育正處在一個大變革的階段。值得注意的是，當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將其改革的重心擺在結構變化的時候，公眾的關注點卻集中在學與教的層面上。產生這種差異其實不難理解，因為教育結構只提供了一個基本的框架，而學與教則是師生日常教育經歷的血與肉。政策的設計者往往關心制度和架構，而制度下的大眾則更關心它的執行情況。對教育界的人士來說，這就是與廣大師生息息相關的學與教。

教育基礎學院是香港教育學院的四個組成學院之一，擁有一支約140名既有高等學位又具豐富中小學教育經驗的教師隊伍。在進行政策和理論研究的同時，教育基礎學院的另一個發展重點，乃提煉和傳播源於基層學校和課室的知識。我們認為，學與教的改進，不能在象牙塔而必須在學校和課室裏進行。因此，教育基礎學院非常重視研究和推廣行之有效的基層教學實踐，以發揮其作為教育知識的改進者和推介者的作用。我們鼓勵在職教師和準教師去努力嘗試和總結來自各校的創意性經驗，而我們則會積極將之改進和發展，使之成為具有普及推廣價值的經驗。

《教育基礎叢書》就是在這種理念下產生的。本叢書的編委希望透過出版一系列叢書，去尋找改善學校教育的辦法，提高學與教的效能，同時也引進海內外的教育新意念。叢書編委會很榮幸能與朗文香港教育出版社合作，希望日後陸續將大量好書介紹給各級學校的教育工作者和關心教育發展的公眾人士。

讓我們攜手，為提高香港的教育水準及改進學校的學與教共同努力。

目錄

序

- 萬事莫如「自由教育」急
威斯康辛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榮休教授 周策縱 1

- 五四新文化運動與近代教育觀念的變革
浙江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田正平 5

第一部分 引言

- 中國的自由教育：回顧與反思 李榮安、方駿、羅天佑 9

第二部分 五四運動的教育影響

- 五四運動的教育啟迪 李榮安 19
- 新文化運動與現代中國教育觀念的變革 杜成憲 29
- 胡適的主義與中國現代教育家的使命 袁征 43
- 五四以來中國教育改革的困境 李亞平 53

第三部分 道德與公民教育

- 五四國民教育思想探源 肖朗 65
- 自我管理與社會責任：馬相伯的教育觀 許美德 81
- 晏陽初的公民教育思想 方駿 89

- 民主與科學：陳獨秀的教育思想 羅天佑 105

- 終身教育、公民德育、通識教育：清華國學研究院
至清華大學的教育詮釋 李玉梅 127

第四部分 平民教育

- 中國平民教育的發展 吳湓球 143
- 白話文教科書與民眾教育的突破 王建軍 155
- 延安教育的演變：教育是目標還是手段？ 高華 169

第五部分 科學與人文教育

- 中國科學社與現代中國科學教育（1914-1924） 馮錦榮 181
- 人文地理學與地理教育學的發展：張其昀的貢獻 區志堅 199

作者簡介

224

序

萬事莫如「自由教育」急

周策縱

威斯康辛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榮休教授

在我的青少年時代，即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至四十年代的時候，常常聽到人們談起中國建設問題，或者現代化問題，由於大家都已察覺到，中國資源有限，往往要考慮應該怎樣先入手呢？換句話說就是：到底要先集中全國人力財力，建設「經濟」，使人民都富足起來；還是該先辦「教育」，使人人提高知識？

這個問題由來已久，中國從古以來多數人都認為「經濟」比「教育」為先。《詩經》的「小雅」裏早就說過：「飲之食之，教之誨之」（二三〇〈鶉之奔奔〉）。《論語·子路篇》也先說到「富之」，然後才說「教之」。孟子和荀子也與此相近。法家如《管子·牧民篇》所說：「倉廩實然後知禮節，衣食足然後知榮辱。」他們提倡「富國強兵」，可以想見不會以教為先。道家起源較早，《老子》主張「絕聖棄智」，「絕巧棄利」（第十九章），對「富」、「教」都不提倡；但他們的理想國「小國寡民」，卻仍要老百姓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第八十章）。《墨子》雖然主張「節用」，還能見到「富則見義」的道理（〈修身〉篇）。但既然提倡「尚賢」，所以又說：「不義（則）不富」（〈尚賢上〉篇）。大概儒、墨的理想人物，還是以教為先，所以顏回才受到孔子賞識。只是治理人民大眾的事，還得「富」先於「教」才行。幾千年來，中國歷史上這種看法相當流行。

不過我們現在所要注意的，乃是鴉片戰爭後中國知識分子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中國一連串給英國、法國、日本戰敗之後，士大夫當然已深深感到中國的貧和弱，所以許多人都提出富強的口號來。記得1960年左右，哈佛大學的費正清和賴希和等教授合著《東亞文明史》第二冊《現代轉型》時，要我為扉頁題字，我就題了「富國強兵」四個字，因為我們都認為，這可代表東亞各國這百多年來的共同目標。大概要到1900年的義和團事件以後，中國知識分子才迫切感到在貧、弱之外，還有個「愚」，所以特別覺悟到「教育」的重要。固然以前也有人這樣指出過了，但這以後才特



別迫切。所以嚴復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發表〈與《外交報》(半月刊)主人論教育書〉，便說：「有要道焉，可一言而蔽也：今吾國之所最患者，非愚乎？非貧乎？非弱乎？則徑而言之，凡事之可癒此愚，療此貧，起此弱者，皆可為。而三者之中，尤以癒愚為最急。何則？所以使吾日由貧弱之道而不自知者，徒以愚耳。」這真是個非常敏銳的看法。嚴復在以後八、九年間都提倡以「教育」救國。接着蔡元培、胡適、蔣夢麟等也多半如此。

可是中國局勢迫切，而教育收效緩慢，病急投醫，不容暇擇。據嚴復的長子嚴璩在《侯官嚴先生年譜》中說：光緒三十一年(1905)嚴復因事往倫敦，孫文也在那裏，便去看嚴。談話間，嚴復說：「以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之於丁，為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着手，庶幾逐漸更新乎。」孫文便說：「俟於丁，為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着手，庶幾逐漸更新乎。」這次對話不但有趣，也很可說明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所面臨的難題和所採不同的態度。

到了民國初年，正當五四時期，像張東蓀等許多人，仍然認為經濟為先。當「六三」大捕學生和上海罷市罷工支持學生運動的時候，陳獨秀發表文章，評論政治，甚至簡單地說：「什麼是政治？大家吃飯要緊。」不到幾天，他就給北洋軍閥的密探抓去坐牢了。再過幾個月，1920年5月，他就到上海組織了中國共產黨，一直學蘇聯去搞暴力革命。再過三、四年，孫文也聯俄容共。以後中國局勢的發展，大家耳熟能詳，就不用多說了。我在抗戰勝利後，也受了時代影響，認為均富是第一要緊事。

直至1948年夏天我初到美國時，才觸發一個大疑問：印地安人已到新大陸至少四萬年了，依然很貧窮。歐洲人一到，卻大不相同，在同樣一塊土地上，為什麼就變得那樣富強了呢？一個簡單的答案當然是，歐洲人帶來了槍、馬和歐洲人三、四千年來發展起來的文明。可是這樣解答仍然不能使我內心平靜，因為很顯然的，印地安人有三、四萬年的時機，有這樣好的一塊土地，只需十分之一的時間也應該可以發展出比歐洲還燦爛的文明來，為什麼卻沒有呢？我想來想去，覺得還是個教育和知識問題。我初到美國一見印地安人時，就覺得他們和中國人體質和文化相似，當時還寫了不少的新詩和小文，把他們看作自己的兄弟姊妹。所以我這疑問，絕對不是不關痛癢的批評，而是一種親切的反思。

幾年以後，我讀到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的十冊大著《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他分析世界上二十八種不同的文明(civilization)在「精粹化」(etherialization)的過程中，是否能不斷地適當「回應」(respond)外在物質的「挑戰」(challenge)，結果發現有十八種文明因為不能適當回應，早已死亡或消滅了；其餘九種也在解體中；只有「西方文明」還在繼續發揚。由於他是站在西洋本位和基督教的觀點分析，當然引起好些爭論。我也不同意他的主要結論，不過他引證極多，有好些分析，倒值得參考。例如他認為一種文明能否生存發展下去，主要的不是由於外在的原因，而實由於內在的原因；不是物質的因素，而是精神的因素。所謂精神的因素，就我看來，還是知識最基本和最重要，推論起來就是教育。

談到教育，中國本來發展得很早，卻大多不是「自由教育」。從古以來，圖書文物都為政府所壟斷；學校也是官辦，只有天下分裂時才有分立競爭的可能。自孔子私人教學起，短期間稍有教學自由發展的趨勢。但秦朝統一後焚書坑儒，以史為師，僅漢初頗有轉機。可是武帝獨尊儒術以後，加上科舉取士之制的建立，陽儒陰法，士子都習於「為聖人立言」，很少有獨立思考的機會；有之，也只能在大框框掩護之下進行。民國以後，真正說來，也僅有五四前期，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提倡「兼容並包，學術思想自由」的幾年裏，才出現「自由教育」的火花。可是二十年代後，很快就「以俄為師」了。今天，中國人只能在「海外」嘗到一點「自由教育」的滋味。

為什麼單是「教育」還不行，必須有「自由教育」呢？

我們現在所提倡的自由民主思想，至少可追溯到十七世紀下半期的英國。在哲學上奠定基礎的莫過於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他在1687年寫成，1690年出版主要著作《人類認知論》(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約莫同時又出版好幾篇論《容忍》(Toleration)的文字和兩篇《政府論》(Treatises on Government)，並於1693年出版《教育》(Education)一書。在「認識論」方面，據羅素分析，他最重要的貢獻是「真理很難證實」(Truth is hard to ascertain)，所以稍有理性的人對自己的意見都該存幾分懷疑，因此必須容忍別人的異議。洛克確立了英國的「經驗論」(empiricism)，還有政治哲學和自由教育，也影響了美國的《獨立宣言》。這根本上阻止了有人「不會錯」(infallibility)的說法。其實這種看

法，中國人早就有了，只是沒有詳盡的論證，未能引起許多人注意，也沒發生過重大的影響。南宋的呂祖謙(1137-1181)就說過：「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可是一直到1959年3月胡適講〈容忍與自由〉時，引了這兩句話，才使大家注意。而絕大多數中國人正在大叫「領袖萬歲」。我也只好寫幾句詩說「眾人已醉存孤憤，舉國如狂拜獨裁」罷了。

教育如果不自由，如果不讓不同的學說和看法並存比較，學生如何能獨立判斷？尤其是在新聞出版，都由一黨控制之下，那就只有盲從了。西洋人有時甚至以為一言堂的教育，可能比不教育還壞。因為學生受了這種「洗腦」之後，再要改正過來，實在不容易。所以他們造出一個「de-educate」詞彙來，這個觀念不好中譯，我曾勉強譯做「退教育」。總之，我認為：我們目前最急迫需要的莫如「自由教育」。

1999年5月，香港教育學院為了紀念五四運動八十周年，召開了「五四運動與現代中國教育研討會」。會後，李榮安、方駿和羅天佑三位教授匯編各論文成為《中國的自由教育》一書，要我寫序。我百忙中寫了這些，只能算是個人一點小感想罷了。書中各論文能說明「自由教育」的重要性，各有優點，很值得大家參考。

丙筆

2000年10月上浣於美國威斯康辛州陌地生市

序

五四新文化運動與 近代教育觀念的變革

田正平

浙江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發生於八十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中國近代教育的影響是一個歷久彌新的話題。五四新文化運動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和深遠意義當然不是一個教育方面可以涵蓋了的，但是，它又確實是首先由知識界、教育界發起，並進而推廣到全國各界的。教育界的受惠於五四新文化運動，即使在當時也為人們所津津樂道，譬如說，廢止民初教育宗旨而代之以七項標準(適應社會進化之需要，發揮平民教育精神，謀個性之發展，注意國民經濟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於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縮餘地)；「壬戌學制」之取代「壬子癸丑學制」；女子獲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學校教學中白話文的廣泛使用；各種教育理論的紛至沓來、百花爭妍；各種教育改革運動、教育實驗活動的蓬勃開展、此起彼伏……。人們有理由這麼認為，中國自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新式教育產生以來，傳統教育的各個層面受到最深刻、最猛烈的衝擊正是發生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

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中國近代教育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在我看來，最重要的影響即是教育觀念的變革。翻檢這一時期新文化運動先驅者們有關教育的言論，幾乎無一例外地都致力於這一基礎性工作。

蔡元培在就任北大校長的演說中，對全校同學提出三大要求：抱定宗旨，砥礪德行，敬愛師長。他明確反對「讀書做官」和「讀書發財」的舊觀念。在愛國女學校的演說中強調，民國成立，欲副愛國之名稱在養成完全之人格，對完全人格的解釋是：首在體育、次在智育，而「德育實為完全人格之本」¹。在清華學校演說時對清華學生的希望是：發展個性，信仰自由，服役社會。在天津的一次講話中更明確地分析了新、舊教育的分歧點。他說：「夫新教育所以異於舊教育者，有一要點焉，即教育者非以吾人教育兒童，而吾人受教育於兒童之謂也。」並提出了他那個著名的觀點：「知教育者，與其守成法，毋寧尚自然；與其求劃一，毋寧展個性。」²



作為新文化運動中的左派，陳獨秀在這一時期就教育問題發表了大量的言論，其着眼點也集中於批判舊教育觀念，樹立新教育觀念。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他告誡青年要作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一代新人。在〈吾人最後之覺悟〉一文中，他大聲疾呼：「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³在1915年發表的〈今日之教育方針〉一文中，他指出「今日教學相期者，第一當了解人生之真相，第二當了解國家之意義，第三當了解個人與社會經濟之關係，第四當了解未來責任之艱巨。准此以定今日教育之方針。」他主張的教育方針是：現實主義，惟民主義，職業主義和獸性主義⁴。在天津南開大學的演講中，他認為，近代西洋教育的本質特徵在於：「是自動的而非被動的，是啟發的而非灌輸的」；「是世俗的而非神怪的，是直觀的而非幻想的」；「是全身的，而非單獨腦部的」。他的結論是，「中國教育，不合西洋近代教育的地方甚多。以上三樣，乃是最重要的。諸君畢業後，或教育他人，或自己教育自己，請在這三樣上十分注意。」⁵此外，在〈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新青年宣言〉、〈新教育的精神〉等多篇文章中，反覆強調了這樣的意思。

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所發表的有關教育的議論主要集中在介紹杜威教育思想的幾篇文章中，如〈杜威的教育哲學〉、〈實驗主義〉、〈杜威先生與中國〉等。在這些文章中，他借着宣傳杜威教育哲學的機會，實際上是全面闡述了自己的教育主張。在〈杜威的教育哲學〉一文中他寫道：「我這一篇所說杜威的新教育理論，千言萬語，只是要打破從前的階級教育，歸到平民主義的教育兩大條件。」⁶對杜威實驗主義的歸結是：「我們人類當從事實上求真確的知識，訓練自己去利用環境的事物，養成創造的能力，去做真理的主人。」⁷

分析上述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們所發表的有關教育言論，可以歸納為兩個方面，一是強調擴大受教育的對象和對受教育者的尊重，即所謂提倡平民教育和發展個性；二是倡導科學的精神和方法，不迷信、不盲從，信仰自由，對一切事物都持一種「評判的態度」。這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所高舉的民主、科學兩面大旗。五四文化運動的先驅者們奮臂高呼、身體力行的正是試圖從思想觀念的層次上為中國新教育的發展做一些創榛辟莽、



前驅先路的工作。中國的近代新式教育產生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至五四新文化運動，整整經歷了八十個年頭。八十年間中國教育的近代化經歷了人們通常所說的器物層次的變革、制度層次的變革，在改革傳統封建教育的過程中逐漸引進了反映近代大工業生產所需要的新的課程體系和教育制度。當然，器物層次和制度層次的變革也同樣伴隨着思想觀念的變革，特別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嚴復大聲疾呼的「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以及他所全面論述的科學的教育功能；王國維所力圖構建的知、情、意、真、美、善和諧發展培養完全人物的教育理想，都深刻地觸及到教育思想觀念領域的變革，在中國近代教育發展史上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但是，受歷史的和現實的條件制約，特別是當封建專制政體還存在的時候，他們的高瞻遠矚受不到重視、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了。中國教育的近代化需要一次自上而下的深刻的教育觀念變革，這當然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完成的。但是，對於根深蒂固的舊觀念而言，確實需要一次大的、狂飆怒潮式的衝擊和掃蕩。辛亥革命後中國的社會條件為這種變革提供了適宜的土壤，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蔣夢麟、黃炎培等一批先驅者自覺地承擔了這一歷史重任。

在新的世紀之交，五四新文化運動為一個歷史事件，又一個八十年過去了。八十年來中國教育的發展，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正是沿着追求民主與科學這一目標而不斷前進的。要使現代社會的每一個公民都有接受教育的機會，要使每一位受教育者的個性都能得到最充分發展，要使科學態度、科學精神、科學知識、科學方法成為每個現代公民必備的素質。正是這些崇高的理念激勵着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上下求索，在各個層面探尋着改革中國教育的正確道路。

在紀念五四運動八十周年之際，一批對於中國教育發展問題有着深刻思考的海內外專家學者，聚會於風景秀麗的香港教育學院，舉行了一次十分有意義的學術研討會。承蒙會議的組織者李榮安、方駿、羅天佑諸位教授的厚愛，使我有機會拜讀與會各位先生的宏論，深受啟發，寫下自己的一點感想。是為序。

田正平

2000年7月上旬於杭州



注釋

1. 高平叔編(1984)，《蔡元培全集》(三)。北京：中華書局，頁8。
2. 同上，頁173-174。
3. 戚謝美、邵祖德編(1995)，《陳獨秀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頁51。
4. 同上，頁32。
5. 同上，頁129-131。
6. 白吉庵等編(1994)，《胡適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頁85。
7. 同上，頁91。



引言

中國的自由教育：
回顧與反思

李榮安、方駿、羅天佑

導言

1999年5月4日，香港教育學院教育基礎學院為紀念發生於八十年前的五四運動，舉辦了一個題為「五四運動與現代中國教育」的研討會。二十多位應邀與會的知名歷史和教育學者非常認真地就大會的主題分享了各自的研究心得。與會者雖然沒有五四當時的慷慨激昂，但卻有着深層的理性思考與反省。會議期間，大家再議五四精神，同時把它聯繫到教育上，啟蒙、解放、獨立、自主、自由、創造、民主、科學等詞彙被反覆提及。很顯然，要達到和實踐它們所代表的理想，就必然要與教育產生聯繫。本次會議的論文都不期然流露出對個體自主的嚮往、對社會自由的期待，以及對公民教育的提倡。於是，本書編者決定將當天宣讀的論文整理修訂，與關心社會、關心教育的讀者分享。由於上述的共通關注貫串着會議的論文，我們把這本書定名為《中國的自由教育》。本書所謂的「自由教育」，並非指課程體系的人文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一種「旨在解放思想和精神，避免專門化和不作就業準備的教育」¹。在這裏，「自由教育」是指源於自由主義精神的教育思想和方法。根據《韋氏國際大辭典》(第三版)，「自由主義是一種建立在對於進步，對於人的基本善性及個人的自主性的信念之上的哲學。它捍衛容忍的態度與個人的自由，使個人在生活的各個領域中不受獨裁權威的宰制。」²

五四與自由教育

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啟蒙運動。它所標榜的內容名目雖然繁多，但歸根結底，都可以聯繫到自作主宰及個性解放的中心

價值上。1919年7月，李大釗在〈真正的解放〉一文中，闡釋了「解放」的本質：「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網開三面』，把我們解放出來，是靠自己的力量，抗拒衝決，使他們不得不任我們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賴那權威的恩典，給我們把頭上的鐵鎖解開，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從黑暗的牢獄中，打出一道光明來。」³ 1920年初，陳獨秀更直言：「解放就是壓制底反面，也就是自由底別名。」⁴

五四時期，思想進步的知識分子所倡導的自由主義，範圍廣泛，包括了政治、經濟、社會、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解放。至於如何能達致自由（解放）的目標，這些知識分子一般都肯定「民主」與「科學」在反對權威、反對迷信方面的作用。事實上，德先生（民主）是用來抗衡舊的政治、制度及倫理道德，賽先生（科學）是用來對付舊的宗教、文化、藝術等。只有打破舊的制度、道德、宗教及文化，個性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故論者謂五四文化價值的取向，是「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科學為用」，不無道理⁵。

五四時期思想進步的知識分子，多主張以教育為工具，提高工人、農民、婦女的文化水平，以幫助他們從黑暗和愚昧中走出來。但必須強調，除無政府主義者外，這些知識分子大部分並非僅僅主張個性的解放。在消極的自由和解放之外，他們亦重視整體社會的改造。1920年代初，陳獨秀力言「改革教育的重點在社會不在個人」⁶，並以教育為「改造社會的重要工具」⁷。李大釗在〈平民主義〉一文中，申論個性解放，「斷斷不是單為求一個分裂就算了事，乃是為完成一切個性，脫離了舊絆鎖，重新改造一個普通廣大的新組織。」⁸無疑，在解放與建構之間，教育在整個轉變的過程中都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故「五四的自由教育」，實在是中國近代啟蒙運動中一個頗有研究價值的課題。

五四的教育思想

本書共分五個部分。第一部分「引言」即本文，介紹本書的緣起、結構及所收各文的要點和特色。

本書的第二部分是「五四運動的教育影響」，由四篇論文組成。李榮安的〈五四運動的教育啟迪〉一文指出：五四運動從最廣義的角度來看，是

一種「借思想文化解決問題的途徑」的新文化運動。它的教育意義主要有幾方面。第一，五四運動作為一個啟蒙運動，其根本在於開啟民智。白話文運動推動「我手寫我口」，將書面語和口頭語劃一，其用意是要讓一般人具有讀寫能力。第二，五四運動源於對社會政治的關注，但其最終關注點還是人的素質發展。「謀個性發展」是當時不少教育改革的關注點。第三，五四運動的基本精神，是對傳統的反思和挑戰。這種反思挑戰的精神，應用到教育，就是強調獨立和自由思考的教育。因此，對思考自由的倡導，可以說是五四教育主張的最大特點。第四，五四時期的教育討論，一個重點是公民道德教育。公民教育是要陽初的「四育」之本，亦是蔡元培的「五育」之本。五四時期，個性教育、人格教育和平民教育等主張跟公民教育也有着密切的關係。李榮安認為，回顧五四時期的教育主張，人們可以見到新文化運動與教育運動的不可分割的關係。當時的社會改革思潮、文化改革思潮與教育改革思潮並軌而進。五四時期的革命家、思想家追尋一個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助的、全民幸福的理想時代與理想社會。在這大前提下，他們的教育主張同時追求平民教育、平等教育、普及教育、個性教育、人格教育、自由教育、獨立教育、科學教育、啟發式教育、以兒童為中心的教育、公民教育等等。這些進步主義的教育主張以救國教育的愛國精神為起點，以公民教育的社會關注為依歸，以個人素質為重點。

杜成憲在其〈新文化運動與現代中國教育觀念的變革〉一文中指出：中國教育曾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形成過一個絢麗多彩的發展時期。在此期間，在大量學習西方教育的基礎上，中國教育在各個領域開展了廣泛的試驗和實踐，在理論和制度兩方面初步奠定了現代教育的發展基礎。作為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新文化運動在教育領域裏的表現，就是對數千年中國傳統教育的深入清算和對中國學習西方、實施近代教育六十年歷程的深刻反思。杜成憲認為，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教育界出現直接向歐美學習西方教育的熱潮，西方的教育思想、方法、模式、制度被大量引進，拓展了人們的視野。同時，中國教育界出現空前活躍的思想局面，國民教育和軍國民教育思潮、職業教育思潮、實用主義教育思潮、工讀主義教育思潮、平民教育思潮、美感教育思潮、科學教育思潮、國家主義教育思潮、馬克思主義教育思想等，都在此時期內或萌芽，或形成，或高漲，或延續，此起彼伏，激發着人們尋求新思想、新理論和探索中國教育出路的熱

情。如此豐富的思潮興起於斯、匯集於斯，使中國現代教育觀念在新文化運動的促動下發生個性化、平民化、實用化、科學化等多方面的變革。

胡適是現代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教育家之一，也是新文化運動中一個派別的領袖。1919年7月，他提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袁征的〈胡適的主義與中國現代教育家的使命〉一文指出，其實胡適並不反對一切主義，而且非常重視理想的作用。近代東方各國人民在接觸了西方文化之後，普遍追求民主自由。但怎樣在缺乏民主主義和社會自由傳統的東方社會實現民主和自由，需要東方學者和政治家的思考。在胡適看來，在中國這樣的國家實現民主必須「再造文明」，創建民主制度能夠生存的文化環境；在這個努力過程中必須保護思想和言論自由，民主主義需要自由主義的配合。袁征認為，在二十世紀，東方各國人民為摧毀專制政治進行了一場又一場武裝革命，卻遠遠未能實現民主的理想。暴力工具成為一種破壞性的力量，而不是建設性的力量。要在中國實現民主的理想，必須靠教育家進行耐心的文化建設。這既需要有明確的目標，又需要有寬容的心態。由於不能在短期內見到成效，而又得不斷地進行努力，因此還需要堅韌不拔的意志。允許各派自由爭鳴的文化建設，作為五四運動的影響，可以說是溫和的，但它可以導致最深刻的社會變化。

中國是一個注重教育的國家，教育在中國的文化構成中佔有重要的地位。然而，當世界進入工業文明以後，中國的教育全面落後了，教育的功能僅僅停留在傳統文化及道德的傳承層面。李亞平的〈五四以來中國教育改革的困境〉一文分階段剖析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中國教育的幾次重要變革，探討中國教育落後的原因。他指出，五四以後，隨着現代西方思潮的湧入，中國的教育自然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蔡元培領導的北京大學。北京大學的改革，不僅表現在「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和方針上，同時也體現在學校體制的變革中。北大的變革表明，中國的教育制度已開始走出中國傳統封閉的教育體系，向現代化邁出了重要的一步。然而，此後中國的教育改革並未由此而深入進行下去。相反，它在國民黨政權建立後，出現了嚴重的倒退，舉步維艱，時至今日，仍然難以走出困境。

本書的第三部分是「道德與公民教育」，由五篇論文組成。肖朗的〈五四國民教育思想探源〉指出，長期以來大陸學術界普遍認為辛亥革命前後

在文化戰線上「是無聲無息的」，致使辛亥革命「基本上沒有觸動兩千年來封建專制主義的經濟基礎與文化心理結構」。肖朗認為，事實上，二十世紀初反清革命派，特別是眾多中國留學生曾為辛亥革命做了大量輿論準備工作，他們所闡發的近代國民觀及國民教育思想也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所發揚光大。有鑑於此，他以二十世紀初《新民叢報》及留日學生創辦的多種雜誌為基本史料，考察留日學生的近代國民觀及國民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徵，兼論這一時期陳獨秀的思想言論，以期探究中國近代國民教育的思想淵源。他認為，近代國民觀及國民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徵表現為：第一，這種近代國民觀及國民教育思想是以西方近代追求獨立、自由、平等的民主主義思想及其教育價值觀為基礎的，就其本質而言已擺脫了中國傳統的民本主義及改良主義的思想範疇。第二，這種近代國民觀及國民教育思想不僅清除了晚清洋務教育的餘毒，而且突破了維新教育思想的束縛，從而為辛亥革命後民國新教育方針的確立奠定了思想基礎。第三，這一時期陳獨秀的言論中也包含了近代國民觀的思想本質，這種思想，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得以繼承和發揚。就上述意義而言，二十世紀初留日學生的近代國民觀、國民教育思想及其所體現的文化革命的精神，可謂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也是五四國民教育思想的淵源之一。

著名的教育家、震旦大學和復旦大學的創辦人馬相伯對早期蔡元培的思想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許美德的〈自我管理與社會責任：馬相伯的教育觀〉一文，追溯上海現代高等教育的發展根源，並探討馬相伯在此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她指出，在馬相伯的教育理念中，學生自我管理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馬氏覺得學生應該訂立他們自己的條規，並按民主原則進行管理。除此之外，馬相伯也很強調學生和學校的社會責任感，這也就是復旦大學能在上海的五四運動中發揮領導作用的原因。

晏陽初是另一位享譽中國和世界其它地區（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的當代著名教育家。然而，專門研究晏陽初平民教育思想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公民教育思想的中外論述，卻少之又少。方駿的〈晏陽初的公民教育思想〉一文着重探討晏陽初的公民教育思想的基本內容及其實施方法。公民教育是晏陽初所倡導的文藝、生計、衛生、公民四大教育中最根本的部分。晏陽初對公民教育應該培養什麼樣的人，以及如何進行公民教育，都有不少論述。這些見解，雖然表達於半個世紀前，但對我們今天的公民教育仍有參考價值及啟發作用。



自五四以來，海內外學者關於陳獨秀的著述，數以百計，但是大部分都集中研究他的革命活動、民主與科學觀、文學革命理論、馬克思主義思想、建黨作用、右傾機會主義等。對於陳獨秀教育思想的研究，相對來說還很少。羅天佑的〈民主與科學：陳獨秀的教育思想〉一文以背景分析的方法，展示教育在陳獨秀的革命思想和活動之中的意義及重要性，並以文獻分析的方法，探討陳氏在民主與科學教育思想方面的進步性、局限性及矛盾性。羅天佑認為，陳獨秀的民主與科學教育思想，在反對傳統迷信和專制及倡導現實主義和平等主義方面，有其進步的時代意義。但在很多方面，如教育的社化（干涉主義）與非社化（自由解放）功能，政治教育中的「精英民主模式」與「參與民主模式」，宗教在科學思潮下的存廢，新舊文化的調和與衝突，人為力量與客觀定律的相互關係等，陳氏的觀點並不明確而且立場亦不一致。這種思想上的吊詭反映出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在面對傳統文化與現代化時所處的困境，也同時反映教育本身所存在的吊詭。

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清華國學研究院（1925-1929）堪稱神話。該院只辦了四年，訓練了四期學生，卻培養出整整一代的「國學」人才；「四大導師」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的許多著作，均成於此時。李玉梅的〈終身教育、公民德育、通識教育：清華國學研究院至清華大學的教育詮釋〉認為：清華研究院的一個特點是倡導終身教育，它所培養的學生大多數都能終身從事教育和學術工作。研究院的另一個特點是重視公民德育的教誨，治學與做人並重。導師傳業態度的莊嚴懇摯，同學問道心志的誠敬殷切，穆然有鶴湖、鹿洞遺風。研究院中，師生之間恩若骨肉，同門之誼親如手足，學生中出現許多品德高尚的愛國人士。

本書的第四部分是「平民教育」，由三篇論文組成。平民教育孕育於二十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成熟於以民主科學喚醒民眾的五四愛國民主運動，發展於「教育救國」思想日益深入人心的二三十年代。吳滄球的〈中國平民教育的發展〉，回顧中國平民教育的發展歷程，並總結其對當代中國教育發展的啟示：首先，平民教育運動符合國情，面向大眾，為喚醒民眾、開啟民智、挽救民族危亡作了有益的嘗試。其次，歷史上的平民教育家摸索創造出的一系列理論和辦學方法，儘管各自都有不完善的地方，但都是寶貴的借鑑。再次，開展平民教育必須要有一批高質量的教育人才，「才高為師，德高為範」。當年，幾乎在所有的試驗區，教育家們都辦有培

育教師或教改骨幹的專門學校，而且強調人才的敬業精神和綜合素質。吳滄球指出，反思當今教育界隊伍的種種弊端，恰恰就是在這些問題上出了一些偏差：教師的師德教育不再被特別重視，教師行業的社會地位下降，師範院校的生源素質不能保證，教師隊伍的持續教育相當薄弱。

白話文教科書的地位得以確立，歸功於1920年代初北洋政府教育部關於廢止文言文教科書的強行規定。這一時期正是新文化運動高歌猛進的時期，也正是近代教育改革深入發展的時期。白話文教科書就是這一歷史背景下的產物。王建軍的〈白話文教科書與民眾教育的突破〉，以具體事例說明，在科學與民主精神的主導下，白話文教科書不僅在語言形式上進行了有效的改革，而且為傳播現代思想作出了更為實在的努力。作者認為，新文化運動所促成的思想解放為白話文教科書的產生提供了契機，文學革命的深入為白話文教科書的發展指明了方向，而科學精神則保證了白話文教科書朝着科學化和大眾化的軌道運行。

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教育方針及理念基本形成的時期，它產生的有關教育的一系列概念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1949年後中國教育的性質和面貌，並由此影響了幾代人的思維、知識結構和行為方式。然而，延安教育是在五四教育的大背景、大環境下產生的，受到五四教育多方面的影響。對於這方面的情況，以往論者較少關注。高華的〈延安教育的演變：教育是目標還是手段？〉一文指出，五四時代，一批先賢先哲為中國的教育現代化作了很大努力，使中國教育面貌發生重大改變，對國家的進步起了促進作用，教育自身也得到了豐富和發展。中共堅持走一條獨特的革命道路，從瑞金時代的照搬蘇聯模式，到延安時期的新民主主義教育，逐漸探索出一套有中國特色的革命教育理論。在這個理論中，中共對五四教育遺產作了重大選擇，對其有利於革命的一面（如平民教育）作了繼承、改造和轉換，同時也拋棄了很重要的內容（如教育的全民性）。高華認為，延安教育是一種大規模的教育改造的實驗，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亦有負面性，這就是教育的泛政治化和極端功利化，這些都對1949年後的教育產生了複雜的影響。然而，延安教育又是二十世紀中國教育遺產的重要部分，它留給人們豐富的啟示，給中國教育未來的變革提供了某些重要經驗。

本書的最後一部分，即第五部分，是「科學與人文教育」，由兩篇文

章組成。馮錦榮的〈中國科學社與現代中國科學教育(1914-1924)〉探討二十世紀初十年間中國科學社及其核心人物在科學教育方面的貢獻。該社由一羣在美國學有所成的中國留學生創立，他們不但掌握了美國研究科學的方法，而且熟知美國科學體制的基本模式源於英國。該社的中心人物任鴻雋可以說是中國對「科學論」和「科學教育論」有深入研究的理論先鋒。他在《科學》創刊號除參與〈例言〉和〈發刊詞〉的撰寫外，並提出「為甚麼中國沒有科學」這一問題，比馮友蘭早了七年。此後，他多次撰文討論科學與教育的關係。馮錦榮指出，中國科學社的骨幹人物，以有限的資源經營了科學事業，為現代中國科學及科學教育作出了寶貴的貢獻。

區志堅的〈人文地理學與地理教育學的發展：張其昀的貢獻〉一文，在回顧張其昀的師承關係後，探討他對中國人文地理學和地理教育學發展的貢獻。區志堅指出，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張其昀的人文地理學說，主要是綜合中外研究成果，但在五四運動前後中國地理學界沿革歷史地理學盛行的情況下，張氏引介的西方人文地理學，乃時代之「異軍」。同時，張氏提出的人文地理學及地理教育的觀點，實與當時流行的科學精神相呼應。五四時期傳入的西學，在張氏的知識資源裏扮演了「催化劑」的角色，從而帶出一套由傳統沿革地理學演變而來的融合中國學術傳統的治學風尚。張其昀成為現代人文地理學者和地理教育家的歷程，起於五四而成於五四之後，其中以1919至1923年尤為關鍵。日後，張氏在中央大學地學系和浙江大學地理系執教，協助二校成立史地研究所和史地教育研究室，編刊《史地研究所叢刊》、《地理雜誌》及《思想與時代》，積極推動兩校成為人文地理學研究和地理教育的重鎮。

結語

綜合上述各篇文章，近百年來中國思想進步的知識分子都能明白教育在改良或革命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們在平民教育、科學教育、民主教育、白話文教育、國民教育等各方面的倡議和改革，皆集中強調個性解放及社會改造。五四運動八十年後的今天，「個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從專制傳統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但是，「社會」卻未能循着自由的、平等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助的、全民幸福的理想而「改造」。科學的發

展仍偏重於科技的層次而忽略存疑態度、求真精神和反對迷信權威的精神。民主在制度上或程序上似有還無，民主的精神和生活仍未能茁壯成長。因此，回顧五四與中國自由教育的發展時，我們必須作理性的和批判性的反思，以探索現在和未來的正確發展路向。本書編者深切冀盼讀者能從中領略到二十世紀中國自由教育發展的借鑑和啟示作用。

本書的出版得益於海內外許多專家學者的支持與合作。首先，「五四運動與現代中國教育研討會」的成功舉辦，有賴香港教育學院校長許美德教授的鼎力支持。許校長最先提議在教院召開紀念五四八十週年的研討會，並親自撰寫論文及參加會議。其次，是次研討會的參與者，除本書的大部分作者外，還有香港中文大學葉漢明博士、劉義章博士、鄭會欣博士、香港浸會大學林啟彥博士、葉國洪博士、香港樹仁學院余炎光教授、香港教育學院葉建源先生、陝西師範大學王雙懷博士、華南師範大學王棟教授、首都師範大學桂勤博士、復旦大學章清博士等學者。他們或參與組織研討會，或主持小組討論，或做論文評閱人，或作會議發言，對提交會議的論文及其主要觀點，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會後本書作者在修改各自的論文時，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他們的寶貴意見。

我們特別感謝五四運動史研究的權威學者、威斯康辛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榮休教授周策縱博士和中國近代教育史專家、浙江大學教育學院院長田正平教授。他們不但認真審閱本書，還欣然撰寫序言，周教授更為本書題寫書名，這些都使本書大為增色。當然，書中存在的一切不足，是本書編者的責任，與上述專家學者無涉。

本書的順利出版，還應歸功於朗文香港教育出版社各位編輯的細心審閱和校訂。在此，我們謹致深深的謝意。

注釋

1. 陳建平等譯(1988)，《西方教育詞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頁170。
2. 轉引自狄百瑞著，李弘祺譯(1983)，《中國的自由傳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44。

3.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1999)，《李大釗文集》(二)。北京：人民出版社，頁344。
4. 陳獨秀(1965)，《獨秀文存》(下)。香港：遠東圖書公司，頁90。
5. 黃克釗，〈五四文化價值取向論略〉。載於丁曉強、徐梓編(1989)，《五四與現代中國：五四新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頁145-150。
6. 同注4，頁571。
7. 同上，頁657。
8. 《李大釗文集》(四)，頁253。

五四運動的教育啟迪

李榮安

導言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學生舉行游行示威，抗議日本先前提出的二十一條以及當年凡爾賽和會關於山東的決議，不單掀起了一場反日運動和愛國運動，同時激發了一連串的、多方面的改革運動。八十年來，五四運動被形容為新文化運動、現代化運動、啟蒙運動、文學革命、白話文運動等等。這些不同的形容固然代表了不同的人士對五四運動有不同的理解；但這些不同稱號同時標示着五四運動的複雜性、整體性，以及其多方面的影響力。五四運動，從最廣義的角度來看，無疑是一種新文化運動，而所謂新文化運動，就是一種「借思想文化解決問題的途徑」¹。

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夢想，是要追尋一個理想的社會。這個理想社會的描述，陳獨秀在〈新青年雜誌宣言〉所說的一段話可以說是最具代表性：

我們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是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互愛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希望那虛偽的、保守的、消極的、束縛的、階級的、因襲的、醜的、惡的、戰爭的、軋輾不安的、懶惰而煩悶的、少數幸福的現象，漸漸減少，至於消滅²。

追尋夢想是要通過教育來達致的。當時的知識分子就努力忠告青年人要在知識上、求學上好好裝備自己。胡適在〈給全體中國同學的一封信〉中說：

就我看來，我們留學生在這個時候，在離中國這麼遠的地方，所應該做的是：讓我們冷靜下來，盡我們的責任，就是讀書……讓我們嚴肅地、冷靜地、不顧騷擾地、不被動搖地去念我們的書。好好準備自己，等我們的國家克服這個危機以後——好去幫助她的進步³。

胡適特別強調「為自己而後可以為人；求學而後可以救國」，「救國的事業需要各式各樣的人才；真正救國的預備在於把自己造成一個有用的人才」⁴。

 平民教育

五四運動作為一個啟蒙運動，其根本在於開啟民智。我們甚至可以說，五四時期的教育運動，就是以平民教育為核心的教育運動。白話文運動推動「我手寫我口」，將書面語和口頭語劃一，其用意是要讓一般人都具有寫字的能力。當時漢字羅馬化的爭論，根本的目的就是要爭取識字普及。杜成憲指出：

教育的平民化是為當時教育界普遍接受的新概念，絕大部分教育思潮都打上了它的烙印。……教育平民化的觀念使社會的教育關注點和活動重心，由社會上層下移到社會下層乃至底層（農村），對教育的普及發生了影響。教育平民化觀念促進教育思潮的形成、平民教育運動的開展和向農村教育、鄉村建設思潮與運動的轉變⁵。

五四事件後，許多學校為工人和窮家子弟開辦了夜校。到1919年底，北京大學理科辦的夜校已有五百多名學生，學生的年齡從七到三十歲不等。其後，類似的夜校相繼出現，還有一些免費學校由學生和商人開辦，財政由商人支持。據說當時學生聯合會創辦的免費學校遍於全國⁶。1923年，陶行知、晏陽初等在北京成立了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會（簡稱「平教總會」）。平教總會成立後，分別制定了全國平民教育運動的十年或五年計劃，以「除文盲、做新民」為口號，在全國各城市、鄉村、機關、街道、軍營、監獄等，從事平民教育運動⁷。

平民教育的表表者有晏陽初、梁漱溟、陶行知等。1920年，晏陽初根據他在法國教育中國工人的經驗，發起了著名的「平民教育運動」。工讀主義的思想，也可以溯源於這個時期⁸。1922年，晏陽初出版了《平民千字課》，並先後在長沙、曲阜、煙台、嘉興等地進行試驗。1928年，他編成《農民千字課》，將平民教育進一步發展為農村平民教育。晏陽初的平民教育，可以概括為推行「四大教育」和採用「三大方式」。所謂推行「四大教育」，是要針對四個問題，即「愚」（文盲）、「窮」（貧窮）、「弱」（衛生）和「私」（公德）。所謂採用「三大方式」是指學校式（學校制度）、家庭式（家庭教育）和社會式（校外持續教育）⁹。晏陽初的主張，除了要通過教育解決當時的國家社會的關鍵問題（愚、窮、弱、私）外，他的「三大方式」的主張，確實提供了非常完備的教育觀。但是，晏陽初教育主張最可貴的地方，是指出了平民教育即農民教育。他說：「平民教育運動得成員們堅信，只有到農村

去，和農民在一起生活和工作，才能給他們辦點實事，使其受益。」¹⁰

與晏陽初一起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的陶行知，同樣是農民教育的促進者。陶行知說：「教育必須下鄉，知識必須交給農民。」1926年，陶行知與東南大學教授趙叔愚籌辦試驗鄉村師範學校。翌年，他在南京創辦了著名的曉莊師範學校（又名曉莊學校），培養了一批獻身鄉村教育的教師，形成了生活教育理論體系。其後，他陸續創辦山海工學團、生活教育社、育才學校、晨更工學團、報童工學團、勞動幼兒團、女工讀書班，組織中華普及教育助成會，創辦《生活教育》半月刊等，並發展了「小先生制」等普及教育的方法。他的努力，對國內二十多個省市及東南亞一帶的掃盲和普及教育運動產生了廣泛的影響¹¹。

五四時期另一個農民教育重要的推動者是梁漱溟。梁漱溟不單以比較東西文化聞名，他同時是一個投身平民教育運動的教育家。與晏陽初相似，梁漱溟的平民教育是以農村教育為對象，畢生致力鄉村建設運動。他的鄉村建設運動其實就是鄉村教育。他創辦鄉治講學所、河南村治學院、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出版《鄉村建設》半月刊，致力培養鄉村建設人才。他說：

這一點從頭[鄉村]建設工作，全是教育工作。我們一點一滴的教育，就是一點一滴的建設；一點一滴的建設，無非是一點一滴的教育；只有從一點一滴的教育着手，才可以一點一滴的建設¹²。

 素質培養與學生為本

五四運動源於對社會政治的關注，很多有關的言論也集中在社會、政治、文化等方面。但是，他們最終的關注還是人的素質發展。「謀個性發展」成為了當時不少教育改革的關注點。1922年胡適等人起草，由教育部公佈實施的《學校系統改革案》中的七項標準中，其中一項就是「謀個性發展」¹³。胡適認為，中學生應該養成良好的習慣。這種習慣的形成，需要勤（切實勤奮）、謹（小心謹慎）、和（虛心學習）、緩（不妄下結論）地去實踐。他說：「做學問要能夠養成『勤、謹、和、緩』的好習慣；有了好習慣，當然就有好的方法，好的結果。」¹⁴「青年學生們要在中學裏便養成這種好習慣。有了這種好習慣，無論是做人做事做學問，將來不怕沒有成就。」¹⁵

不少論者指出，五四啟蒙運動的重點是要喚起羣眾的自我意識，是以人為本位的¹⁶。杜成憲指出：

對民主科學的呼喚，對文化傳統的反思，對專制主義的批判，折射於教育，即是增強了人們對個人價值的肯定，對個性化教育的倡導。「個性解放」是新文化運動時期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覺醒與反抗傳統的標誌，它包含了個人思想上、行動上的解放和對個人尊嚴與權利的要求。……「個性解放」的思想體現於教育，首先強調每個人都有通過教育謀求個性發展的平等權利和機會，要求國家和社會提倡個人主義，尊重個人價值，在教育上「使每個人享自由平等之機會而不為政府、社會、家庭所抑制」。個人的教育權利受國家保障。其次，要求在教育中尊重個人，又從尊重兒童始，甚至以「兒童為中心」¹⁷。

胡適認為，學生求學，要注重自己的個性去向。他說：「希望青年朋友們，接受我經驗得來的這個教訓，不要問爸爸要你學甚麼，媽媽要你學甚麼，愛人要你學甚麼。要問自己性情所近，能力所能做的去學。這個標準很重要，社會需要是次要的。」¹⁸ 陳獨秀在《新青年雜誌宣言》就提出，「我們相信尊重子女人格和權利，已經是現代社會進步的實際需要，並且希望他們個人自己對社會責任有徹底覺悟。」¹⁹ 羅天佑亦指出了陳獨秀「新教育精神」的貢獻，在於他提倡將「教訓式」的教育法改變成為以學生為中心的「啟發式」教學法。他指出：

「新教育」的意義，對他來說，是將「教訓式」的主觀教學法改變成為以學生為中心的「啟發式」教學法。教師必須充分了解學生的經驗，研究兒童的心理，留意學生的反應，從而設計適合的教授方法。為了使學生容易掌握知識，……他建議教師要以學生為本位，細心觀察不同學生的特性和才能，靈活地運用教材和方法——作文、英文等科要平常多方練習，地理要注重實地考察，化學要注重實驗——才可以得到好的教育效果²⁰。

◎ 獨立思考

五四運動的基本精神，是對傳統的一種反思和挑戰。正如胡適所說，「新思潮精神是一種批判的態度，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問題和輸入學理。」²¹ 這種反思挑戰的精神，應用到教育，就是強調獨立和自由思考的教育。因此，對思考自由的倡導，可以說是五四教育主張的最大特點。蔡元培指出自

己的教育主張可以歸納於兩條：對於學說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為主，對於教育以學詣為主。有關對學說的態度，他說：「對於學說，仿世界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²² 他任北大校長以後，即宣佈了大學教育的三個方針：(1) 學校是學術研究的地方，而研究最終是要創造一種新文明。(2) 學生不應把大學視為自身專業以外的課程。(3) 大學應維護學術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允許學生參加政治活動，鼓勵學生自治，成立了各式各樣的學生社團，消除教授和學生間的隔閡，成立進德會，一方面重視大學生的道德標準，另一方面伸張社會公義²³。

胡適也主張教育獨立，他認為「只有在自由獨立的原則下，[教育]才能有高價值的創造」²⁴。因此，他主張我們應該歡迎反對的言論，「我們有我們的天經地義，他們有他們的天經地義。」正如上面所引述過的，胡適指出新思潮是一種批判的態度，而這種批判的態度，是要通過「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手段來達致。所謂大膽假設，就是人人可以提出假設。所謂小心求證，是指如果證據不足，「就寧肯懸而不決，不去下判斷，再去找材料。……在求證中，自己應當自覺的批評自己的材料。材料不滿意，再找新證據。這樣，才能有新的材料發現；有新材料才可以使你研究有發現、有結果、有進步。」²⁵

◎ 公民道德教育

五四時期的教育討論，其中一個重點是公民道德教育。晏陽初認為公民教育是「四育」之本，而蔡元培則以公民教育為「五育」之本。晏陽初所提倡的「四大教育」，以公民教育最為重要。他說：「我們辦教育，固然要注意文藝、生計、衛生，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了根本的根本，就是人與人的問題，大家都是自私自利，國家就根本不能有辦法，絕沒有復興的希望。」²⁶ 蔡元培對公民道德教育亦甚重視。在一片教育救國聲中，蔡元培特別提醒國人公民道德其實是教育的根本：「五育以公民道德為中堅，蓋世界觀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軍國民教育及實利主義，則以道德為根本。」²⁷ 有關公民道德的價值觀，他以儒家的「義」、「恕」、「仁」比作西方的「自由」、